乡下女进城记——论王安忆的城乡书写

李欣蔚

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阜阳

【摘要】王安忆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持续关注城乡关系的断裂与融合，对于“乡下女进城”这一现象在文本中也有所呈现。以《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为核心文本，文章探讨了乡村女性在进城过程中所面临的性别规训、生存压力与成长环境，揭示她们在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漂泊与身份焦虑。通过细腻的日常化叙述，王安忆刻画了女性在城乡夹缝中的挣扎与坚韧，表达了对边缘个体深切的人文关怀，也赋予都市叙事以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王安忆；城乡书写；《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

【收稿日期】2025 年 8 月 11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9 月 12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47

The story of a country girl entering the city——on Wang Anyi's urban and rural writing

Xinwei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Wang Anyi’s fiction has consistently focused on the disjun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pace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women entering the city.” Using *Fuping* and *Plant Water Chestnuts Above, Lotus Roots Below* as core text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gendered norms, survival pressures and growth environments that rural women encounter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migration. It reveals their experiences of spiritual dislocation and identity anxiety ami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rough subtle, everyday narratives, Wang Anyi vividly portrays the struggles and resilience of women caught 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expressing a profound humanistic concern for marginalized individuals and enriching urban narratives with greater cultural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Keywords**】Wang Anyi; Writing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uping*; *Plant Water Chestnuts Above, Lotus Roots Below*

引言

“乡下人进城”是贯穿中国百余年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命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着不同的时代内涵，却始终与我国城乡关系变革的现实紧密相连。进入新世纪，伴随着社会转型发展与城市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无数怀揣改变命运憧憬的乡村民众涌入城市，渴望在城市落地生根。由此引发了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这一社会现象投射到文学的创作领域，便形成了“乡下人进城”的书写潮流[1]。

王安忆在从事小说创作以来，不断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交叉书写，尤其以都市书写独树一帜。她的创作有三个特征：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2]。王安忆的作品中始终缠绕着一种尖锐的女性意识矛盾，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渴望与生存困境的桎梏构成最直接的矛盾。她选取城市中具有乡村意味的具象作为城市书写的重心，并聚焦城市市井人物的命运，关注个体生命尤其是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展现了以上海为创作中心的都市丰富样貌。从《流逝》到《纪实与虚构》，王安忆的写作逐步由知青叙事转向人性探索。再到 1995 年发表的《长恨歌》，她的都市书写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海派作家新的传人[3]。进入新世纪，王安忆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审视历史与身份认同，创作出了《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作品。通过对乡村女性进入城市边缘生活的描写，展现了她们在面临生存、成长困境与精神漂泊时是如何抵挡、蜕变的，底层人民朴素的生命力和乡村诗意，凸显了日常生活的质感和世情审美，丰富了都市叙事的文化内涵。

1 离乡者的驱动力

1.1 时代浪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进程中，利益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城乡结构经历了重新组合，工业化进城的加快涌现了大量工厂，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而农村土地承包制虽释放了生产力，却难以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使得进城务工成为改善生计的重要选择。同时，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过去严格的户籍限制和人口流动壁垒，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城市生活所代表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发展机遇以及个体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多种因素促使乡下人涌入城市，谋求更多生存空间。

王安忆的创作始终与这一时代浪潮契合。新世纪城市化进城的加速与社会转型的深化，推动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这一现实在她的文本中得到直接呼应。《富萍》以 20 世纪 60 年代文革前夕的上海为背景，彼时工业化初期的城市已开始吸纳乡村劳动力，工厂的兴起、城市服务业的需求为乡村女性提供了挣脱土地束缚的路径，富萍从苏北农村进入上海务工，正是这一时期城乡人口流动浪潮的文学缩影；《上种红菱下种藕》则聚焦市场经济浪潮下的江浙农村，随着乡镇企业兴起与商品经济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领域，秧宝宝父母外出经商、她被迫离乡寄住城镇，恰是城乡经济结构调整引发个体命运变动的微观呈现。王安忆将创作植根于时代浪潮中的城乡关系变革，使作品成为社会转型的文学镜像。

在“乡下人进城”这一题材的小说中，一些作家给乡下人进城设置了种种“阻碍”，使乡下人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经历接踵而来的矛盾冲突。与此同时乡下女进城书写与中国现代化转型相伴随，延续着 90 年代以来“底层写作”的人道主义立场和现实主义传统，主要创作模式是对乡村女性从身体堕落和灵魂畸变方面进行刻画，并对城市文明和男权文化进行批判[4]。也有一些作家尝试打破二元对立思维，将叙事的关注点放在人物本身的主体性建构层面。城乡之间的流动带来“进城”叙事的新变，在新世纪“乡村女性进城”小说创作中，表述的主要对象逐渐转向了进城女性，作家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她们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困境。

在此方面，王安忆具有代表性。她往往以常态化的叙事直面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探寻普遍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追求。王安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棵“常青树”，从未中断过对城乡故事的讲述，也从未停止过对城乡社会中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怀。她的作品中不乏对女性形象的描摹和刻画，根据自身的城乡生活经验和对现实变化的洞察，通过文学想象表述了她眼中的城乡世界，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意义。创作《长恨歌》可谓是开始了王安忆思想一个转折期，从此她开始找到了思考性别问题的新视野。王晓明认为《长恨歌》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家似乎开始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刻意疏离，而意欲创作一个新的上海故事[5]。王安忆对上海的重新塑造使得她可以在全球资本的大潮中打捞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劳动阶级的独特经验。这个转折也标志了王安忆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1.2 个体抉择

发布在新世纪之初的《富萍》可以说是王安忆新上海故事的典范，沿着居住在上海的一批女性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展开来。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文革前夕的上海，王安忆对世俗生活的书写，在《富萍》中延伸至梅家桥闸北棚户区，上海的声音与气味在作者笔下获得了物质形态。富萍这个在苏北农村被叔婶抚养长大的孩子，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像一株浮萍飘荡在城乡的夹缝中经历了三次出走，并且在帮佣、择菜、洗衣的琐碎中，完成了对上海世俗生活的初步探索。

富萍的离乡可以说是她为了摆脱依附与寻求自主做出的个体抉择。富萍来自苏北乡村，她在乡村的生存状态带有强烈的依附性：被安排的婚姻、缺乏自主的生活轨迹，让她对被安排的人生产生抗拒。进城对富萍而言，是对被动命运的逃离。上海作为城市，提供了脱离乡村束缚的可能，她凭借劳动获得了独立收入，不必依附于婚姻或原本的家庭，城市里陌生人间的疏离感，反而成了她保持自我的屏障，让她得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寻找生存的主动权。从“淮海路”到“闸北区”再到“梅家桥”正是富萍的选择道路，作者有意与老上海的风花雪月的故事拉开距离，描写和大家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上海。梅家桥同淮海路完全不同，它古老的原始生存方式和住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是王安忆一直追求的城市理想。这里的青年虽然身体残疾，但是意志坚强。离乡的富萍始终在城市中漂泊，来到这里使她一颗惶恐慌乱的心平静了下来，并暗暗生出了勇气。梅家桥母子身上的品质正是王安忆所珍视的原始农民身上的淳朴性格，这也正是王安忆为何放弃上海市民富于诗意的日常生活，以梅家桥的棚户区充当故事的主要场地，她用《富萍》表达了自己对城乡生活方式的探讨。

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秧宝宝的离乡则伴随着身份限制的不可抗争性和对生活可能性的探索。九岁的女孩秧宝宝生活在江南水乡，因父母外出经商，不得

不来到华舍镇李老师家寄住，在城镇现代工业文明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秧宝宝的离乡使得原本安稳重复的生活变得充满未知。进城之于她，是一种对成长空间的探索，是一个充满未知的场域，她可以接触到不同于水乡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甚至通过短暂的寄居体验另一种生存状态。这种探索并非单纯为了扎根城市，而是为了在与故乡的对比中，确认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摆脱成长中的迷茫。

“离乡与归乡”这一叙述模式，继鲁迅开创后在不同文学文本中被反复使用，以表达故事主人公变化着的眼光[6]。《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离乡者相比于往昔，呈现出崭新的一面，表现出与前几代村民进城迥然不同的姿态。书中的秧宝宝没有“长大”，只是“从一个小女孩，变成手脚更细长的小女孩”。这种“未完成”的描写，暗示着成长本身的开放性，她既未被乡村吞噬，也未被城镇同化，而是保持着某种原始的生命力。

在小说中，乡村与城市是离不开的两大空间类型，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也与这两种地域空间所构成的文化、风俗、理念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学作家们常常通过对小说空间环境和对“人”的书写来表达自我的文学理想与追求。在王安忆的这两部作品中，时代驱动与个体因素下的离乡者分割着城市与乡村，与此同时乡村和城市作为两种极具差异性的符号系统，也在某种程度上分割着当代文学的空间[7]。在对进城乡村女性的叙述中，王安忆以一种日常化的叙述方式，将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相连接，于日常生活中展现普遍人性的多样化，她的写作是对乡村女性形象的重新描摹，以人为本的创作态度洞察到了女性生存的本质，也是一种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

2 城乡融合与女性困境

2.1 性别枷锁

乡村女性进入城市所面临的无法避免的困境之一便是城乡双重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性别规训所形成的枷锁。“如果我完全没有强迫你，并使你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你却依然选择了我为你预设的道路，那就是我开始运用权力之时。”这句话出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认为社会对于人类的规训并非用暴力控制，而是通过一种细微的权力网络，使个体自我监控、自我修正，直至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的期望。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社会中的性别平等是持续已久的重要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劳动者进入了大众视角并逐渐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王安忆本人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曾经对性别平等问题心存疑问。在 1988 年的一个采访中，王安忆就表示中国妇女在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性别平等地位以后其实很辛苦，因为她们在参加社会工作以外还要承担家庭工作，她坦言性别解放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

女性作家的身份和生活成长的环境使得王安忆对于乡村女性的生活遭遇和命运处境格外关注。乡村女性在社会推动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来到城市，想要凭借自身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城乡意识形态的深层隔阂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常常让她们在城市中碰壁，从而陷入对未知的恐惧与迷惘。王安忆在小说中并未对乡村女性在城市中遭受的事情具体详细地书写，她用日常化的语言使小说中的矛盾冲突感减弱。富萍从乡间来到城市，在上海弄堂和陌生的街道间辗转，乡土的羁绊被冲击地零零散散，她徘徊在乡村与城市的夹缝中，乡村已无容身之地，上海霓虹又无法真正触碰，正如她的名字一般如浮萍漂泊在异乡。

王安忆的作品勾勒出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女性出走的图谱，通过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塑造，展现了从生存驱动到精神觉醒的多元“出走”形态。这种出走既是物理空间的迁移，更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生存方式与精神桎梏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娜拉出走”这一话题自从鲁迅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后，一直是作家笔下热衷表达的话题，并由此形成了百年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在上世纪鲁迅、丁玲、巴金、曹禺等作家笔下一些女性形象，都表现出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娜拉出走”的不同方式和立场。“堕落”与“回来”是鲁迅对娜拉出走后可能性命运的两种预测。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由于社会与思想的进步，她们想要追求人格独立与个性解放。然而在追求的过程中却因受到阻碍以及自我梦境的破碎导致“堕落”，最终她们为了生存再次“回归”，从而形成“出走”与“归来”的二元困境[8]。

《富萍》中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女性角色所面临的性别枷锁，体现在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固有期待与规训中。书中未婚夫的奶奶和一众保姆女工，她们被默认应遵循传统的性别分工，在家庭中承担起照顾他人、操持家务的责任，在社会中则承担保姆、女工等服务性质的工作。这种对女性的行为规范像无形的绳索限制着她们的自我发展，让她们在追求个人意愿和独立空间时屡屡受阻。社会似乎更看重女性在家庭框架内的价值，而忽视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诉求与潜能，这种基于性别

的偏见和束缚，让她们在成长和生活中不得不面对更多来自外界的压力和限制，难以真正摆脱被定义的命运，只能在既定的性别轨道上艰难地寻找自我的位置。

2.2 生存困境

富萍作为一个从苏北农村进入繁华上海的乡下女，被命运推着向前，她所面临的首先是安身立命。在作品中，城乡融合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一场裹挟着文化碰撞与身份撕裂的生存实验。小说以 20 世纪末为背景，将苏北农村女孩富萍抛入上海弄堂的生存漩涡。富萍初入上海时，带着乡村少女特有的质朴与倔强，试图在城市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城市并未如她想象中那般张开怀抱。弄堂里的居民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这个外来者，方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的差异，在她与本地人之间竖起无形的壁垒。她跟着未婚夫的奶奶做工、学习上海话、适应都市生活节奏的过程，实则是不断被规训、被重塑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与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婚姻与情感领域，富萍的困境更具代表性，传统乡土社会的婚姻观念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束缚着她的选择。未婚夫的家庭以“门当户对”为由，试图将她纳入既定的婚姻轨道；舅妈的撮合与安排，看似为她考虑，实则也是为了自身利益打算。富萍想要挣脱这一切，追求自由的爱情与独立的生活，却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她的反抗与挣扎，不仅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更是在城乡文化夹缝中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艰难探索。

除富萍外，小说中的舅妈作为在城市中扎根多年的“新上海人”，表面上融入了城市生活，骨子里却依然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生存智慧与价值观念。她在弄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在家庭琐事中操劳，看似坚强独立，实则在男权社会与城乡文化的双重压迫下，逐渐失去了自我。还有那些在纺织厂与富萍一同劳作的女工们，她们为了微薄的收入在流水线上耗费青春，婚姻与家庭成为她们唯一的出路，而这条出路往往又通向另一个牢笼。城乡融合的进程中，女性成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她们既要面对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歧视，又要承受来自传统乡土社会的道德束缚。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她们通过参与底层劳动重构生存空间，试图寻找一条突围之路。然而，这条道路布满荆棘，充满未知。

2.3 成长困境

如果说富萍面临的是生存困境，那么九岁女孩秧宝宝则是以孩童视角向读者展现了她在成长中面临的困境。她的困境并非生存上的艰难，而是精神上的迷茫和不知所措。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城乡融合的浪潮为故事铺开了独特的时代画卷，也将秧宝宝的困境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故事以九岁女孩夏静颖为主线，彼时市场经济的劲风席卷江浙农村，秧宝宝父母外出经商，她被迫离开乡下沈娄那充满温情的老屋，寄宿到华舍镇的李老师家。从乡村到城镇的位移，是城乡融合的直观体现，也是秧宝宝成长困境的开端。

华舍镇作为城乡过渡地带，一面残留着乡村的质朴，一面已被城市文明的曙光浅浅触及。在这里，秧宝宝带着乡村女孩特有的敏感与倔强，艰难摸索着融入新环境。城镇的生活节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都与乡村大相径庭。在李老师家，尽管李老师一家善良，但寄人篱下的微妙处境，仍让她时常感到孤独与不安。她在城镇的大街小巷穿梭，看着新兴的轻纺工业兴起，化纤布厂、印染厂林立，这些城市文明催生的产物，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与秩序，而她只能茫然地看着这一切变迁，却无力掌控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她正处在童真渐褪、少女意识初萌的关键时期，城乡融合与寄居生活带来的精神冲击，加剧了内心的矛盾与困惑。乡村传统的质朴情感，在城镇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显得格格不入，她试图在新环境中寻找真挚的友情，但与蒋芽儿、张柔桑的交往中却在磕磕绊绊中不断受挫，因为不同成长背景下的价值观念差异，使得她们的友情充满波折。在亲情上，父母长期在外经商，乡村老屋承载的亲情记忆，与城镇里父母缺席的现实，形成鲜明反差，让她在情感上无所归依。秧宝宝在文化碰撞的夹缝中求生存，在情感的荒原上寻慰藉，既要努力适应新环境带来的改变，又难以割舍乡村记忆中的温暖。这种困境，既是个体成长过程的无奈，也是时代变革浪潮下群体的缩影，展现出人性在城乡融合这一复杂进程中的脆弱与坚韧。

“人类其实是一个漂流的群体，漂浮是永远的命运。”这是王安忆曾经对人的生存体验和命运的理解。城市化席卷全球的进城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亲情解体、人文价值失落。漂泊和离散成为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常态，而无名和无根则成为全球语境下人们的共同感受。情感作为日常生活中最私人和与心灵最贴近的方面，也是王安忆小说世界的重要构成，展示了日常生活中人摆脱功利心具有超越性的一面，同时也写出了小说中人物遭遇的精神层面与生活层面的困境[9]。在这些情感故事中，人物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表达超功利的情感诉求，显露出诗意的气质，然而那微弱的诗意往往经不起现实洪流的冲击。

在城乡融合的浪潮中，个体命运随波逐流，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中生长蜕变，完成身份的重构。王安忆也

通过这种“在裂缝中生长”的叙事，揭示了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身份困境——她们既无法彻底回归传统，又难以完全融入现代，只能在两种文化逻辑的撕扯中寻找微妙的平衡。过程中难免有坎坷曲折，虽然有不平等不和谐的因素，但绝非尖锐的对立状态，而是在对话中走向融合。

3 寻找精神的栖息地

3.1 市井烟火中安顿

上海生活短暂的迷茫与不适应没有使富萍返回乡村，她通过自身劳动在底层中重构生存空间。富萍最初是带着某种本能的依附心理进入城市，在城市中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归属，她靠依附于男性、顺从环境来获得立足之地，但始终被都市社会边缘化，她在城市中看似呆下去了，有了立足之地，但精神上始终无家可归，生活中缺乏真正的情感连接，也缺乏价值认同，没有明确的目标，更多是一种生存的惯性和情绪的迁就。依附他人终究无法真正获得安稳，在弄堂的生活中，富萍做过保姆、当过女工，在通过劳动获得了报酬后，富萍的内心终于有了一丝安全感，也是她后来敢于反抗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底气来源。富萍的生活有坚守有妥协，她的妥协体现在对现实规则的接受，而她的坚守则隐含在对体面生活的隐秘渴望中，始终不肯彻底堕落，维持着某种情感的完整与内在的自尊。

小说的最后一章名为“大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水属阴，与女性相关。“大水”这章俨然是对女性和劳动结合的欢庆，这种结合使得富萍这朵无根的“浮萍”得以在上海这个大城市生根结果[10]。小说中作者塑造了若干个底层劳动女性形象，她们貌似在城市中站住了脚跟，深得城市生活真谛，但始终被排除在城市核心生活之外。王安忆写出了富萍的无奈与迷茫，但却让她在梅家桥获得了勇气和生存的希望。浮萍依水而生，在小说结尾处，怀孕的富萍正坐在苏州河的一艘船上，她的未来是迷茫的也是坚定的。在这个发大水的城市，在上海的棚户区，她获得了精神的栖息，生活诗意而温暖。

3.2 体悟中蜕变

秧宝宝与富萍不同，成长的困惑使她用天真的眼睛迫切地向外探索，城乡融合中文明蜕变的隐喻与主人公的成长紧紧缠绕在一起，秧宝宝以乡村到城镇的流动观察与日常体验为路径，探寻着一份兼具质朴本真与成长韧性的精神栖息地。

王安忆曾说农村生活最符合人性，最能让人充实和平和。但小说中，她并未让秧宝宝回归田园，这种处理方式，恰是作者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深刻反思。王安忆以孩童视角消解了宏大的时代叙事，让秧宝宝的命运成为一面镜子，照见江南水乡的阵痛，也映出每个个体在变迁中的挣扎与成长。她的结局没有答案，正如王安忆所说：“成长本就是一场漫无目的的远行，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与心境。”离开时，秧宝宝特意绕道蒋芽儿家，两人相约“哪里也不去”，最终却不得不面对分离，这种被推入新环境的无力感，正是王安忆对个体在时代洪流中命运的真实写照。对待城市，王安忆的态度始终偏于暧昧，短暂的知青下乡岁月对这位生长在城市的作家而言曾是痛苦和煎熬的，她在早期作品中曾毫不掩饰地谈论自己对乡村的厌弃与对逃离的渴望，村庄一度成为她笔下脏乱、落后的代名词和不愿触及的过往。但当作者持续在城市中生活，车流与霓虹充斥的都市色调愈演愈烈，鸡犬相闻的乡土记忆真正远去，这段无法抹去的生命经验就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显露出它的意义。

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孩童的眼光使故事天然地具有理想化色彩。作者以秧宝宝为叙事视角，细腻捕捉小镇的细微变迁。借助孩童特有的懵懂无畏视角展开叙事，将小镇日常转化为人类生命原初的世界记忆。小镇居民虽为生计奔波，却并未像城市日常叙事中那般沦为漠然的社会众生，反而留存着农耕群体特有的天真执拗与慵懒闲适。秧宝宝与蒋芽儿的父亲兼具谨小慎微的商人特质与单纯朴素的农民本色，两个女孩“秧”与“芽”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作者对自然时序的深切关注与热爱。在充斥钢筋水泥、汽车高楼的城市中，节序流转往往难以引发关注，但将视野投向村庄小镇，面对裸露的泥土与河流，与农耕活动相关的四时更迭便显得格外明晰。在“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地域空间中，作者以饱含温情的笔触描绘老屋与村落的全貌。在日常闲谈间，她将自身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美好记忆交融整合，构建出一幅融合未来与过去的理想化图景。尽管外出与外来人口持续流动，未来走向尚不明朗，但此时的华舍镇已成为作者及众多群体共同的精神栖居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因九岁女孩的眼睛而失真，也没因为看世界的眼睛只有九岁充满天真[11]。秧宝宝的成长也伴随着她对乡村与城市生活的体察和体验，这些历程在她的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共同熔铸成生命中的一部分。

4 结语

在乡下女进城的书写叙事中，王安忆通过细腻书写，描绘了城乡断裂背景下个体命运的沉浮与社会结构的张力，通过这一叙事脉络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城乡断裂背景下潜在的制度性排斥与文化歧视。被时代浪潮推动向前的乡村女性，进城后不仅面临性别枷锁，同时应对生存和成长困境，王安忆描写富萍和秧宝宝，强调的是女性作为边缘人和异乡人如何在城乡断裂发展中求生并维系精神的完整，强调她们通过行动来摆脱现实困境，实现自我的主体性。王安忆并不把这些女性书写为悲情主体，而是以极为冷峻克制的叙事姿态展现她们如何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生存逻辑。城乡断裂发展的时代趋势在这些进城的乡下女性身上得以连接，无论是个体、乡村还是城市，都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发展，构成了新世纪的社会风貌。同时，相较于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乡村青年的彻底溃败，王安忆赋予女性以劳动诗学的救赎可能，但未解决结构性压迫，小说最终的结局具有一定的开放空间，是对现实复杂性的尊重和压迫难以根除的无声注解，文本的未完成性是留给主人公和社会发展的议题，也构成了王安忆城乡书写的重要特质，折射出现代女性在主体建构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 刘虎.日常叙事·人物形象·城乡关系——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新书写[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2(06):122-128.

[2]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J].读书,1996,(06):37-43.

[3] 戴娜.论王安忆近作中城市漂泊者的精神困境书写[J].都市文化研究,2024,(01):243-252.

[4] 郭阳.新世纪小说中的进城务工女性书写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3.

[5]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J].文学评论,2002,(03):5-20.

[6] 霍彦珊.乡土生命触角的延伸——论王安忆新世纪城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3,42(07): 118-121.

[7] 郑慧敏.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城乡关系叙事[D].南京师范大学,2022.

[8] 薛晨鸣.“出走”与“归来”的二元困境——现代作家笔下的“娜拉出走”母题探析[J].名作欣赏,2018,(08):72-75.

[9] 胡红英.大历史视野下小人物的脆弱诗意——王安忆小说中的情感困境及其制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01):174-189.

[10] 朱萍.王安忆的新上海故事:《富萍》中的女性和劳动[J].小说评论,2021,(05):37-43.

[11] 许辉.王安忆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叙述视角[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4):117-119.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